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四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一六期 ——  
（二〇〇九年九月七日报出）

---

本期目录 （zk0909a）

【童年旧事】	红色娘子军	陈丹青
【亡灵祭坛】	纪念毛清猷老师故世四十年	邱励欧
【恐怖年代】	关于文革的一段记忆	陈迈平
【往事如烟】	文革中的一件命案	宛 达
【难忘岁月】	打死一个，吓死一个	罗海鹏
【度日如年】	听敌台	阿 城
【劫后反思】	在红卫兵四十年聚会发言	骆小海
【各抒己见】	二〇〇九年的八·一八	刘自立
【人物春秋】	“凌伊”先生	朱学勤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童年旧事】

红色娘子军

• 陈丹青 •

谢晋当年要算得时髦的，他早就懂得英雄美人的好莱坞美学：40年代下半段谢先生从影立志的上海滩正是好莱坞电影的天下，长辈回忆，“大光明”、“美琪”几家首轮电影院甚至在上海解放后照常放映美国电影，朝鲜战争打响，美国片这才落市绝迹。三十多年后，好莱坞重又风靡全中国，那时的电影人，电影观众，早已换代，直看得张口结舌。

后来我在美国算是看饱了好莱坞片子，终至看厌，轮到对着中国大陆的新影视张口结舌地看，连带着回头观赏我们自己的老电影，也另是一番新鲜。

最近在香港买得《红色娘子军》影碟，回家放看，那王心刚活脱90年代好莱坞青春偶像

布拉德·皮特，临刑慷慨，也一脸性感让人疼，不因他是“连长”，而是他好看。我至少听过三位当年的革命少女自称迷他迷得要死掉，日想夜想想豁边。那祝希娟，以目下“新时期”中国影视的美女标准，若非当年谢晋好眼光，祝小姐怕是没戏。其实单看她丰唇一撇，横眉怒视目光灼灼那股子野性，就直追性格女星朱迪·福斯特之流，造型犹有过之，如今别说影视圈脸谱不见这等好样子，连类似的长相似乎也不来投胎了。这部戏成全了祝小姐，祝小姐也成全了这部戏。看到娘子军成立当天开步走，俩村姑直愣愣跟在队伍后面，又见女连长当头只问得一句：“什么阶级？”虽是如今听来可笑可叹，还是感动了：那串镜头不用到什么手法，一笔笔下去实在质朴饱满。琼花的泼辣暴烈，演来也鲜活如有其人，且是重彩的、南国的那么一种民风。到她生擒仇家用链子牵着游行，当街自诉冤苦，忽然哭起来，也真是女儿家的柔弱动人。可感谢晋会选角儿会用角儿，导引祝小姐的脾性发作成一节节活泼剧情，而《红色娘子军》全片拍得是郁勃矫健，一路贯气，日后任他怎样使劲，毕竟难追这等风采了。

所谓革命文艺也自有它的生理周期，那时，新中国的“革命文艺”精力旺，年纪轻。

吴琼花自己被批斗的时候也很年轻。我是说，看《红色娘子军》，忽儿就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小学刚毕业，忽一日撞见了批斗祝希娟。

上海安福路，路右路左分别是“上海人艺”和“上海青话”，现在不晓得挪了地方没有。“文革”初起，课业停顿，小孩子四处游荡，因我家舅舅是人艺演员，我就梦游似的逛到安福路——欧洲“安那琪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之流其实从未亲见无政府世道，我们见到了：那一阵，所有院校机关大门洞开，路人任意闯入。大人是为了“革命串联”，小孩子就是玩。门房在哪儿呢？我记得“人艺”门房口竟是有位俞丽拿站在那里：我知道她是俞丽拿，因为家里被抄走的“梁祝”唱片而在哪里留心过她的照片，只见她撇开腿站着操把琴，飞快地拉着练习曲，同时飞快地同别人说话。祝英台会说上海话？我忽儿惊讶欢喜。她为什么要在门房口练琴？为什么这种时候练琴？小提琴多好听。要不是“安那琪”从天而降——这译名也好听，差一字就是“天使”译名“安琪尔”——小孩子哪能站在俞丽拿跟前不被赶开，听她拉琴？

洋人管小孩子都叫“安琪尔”。我猜，全世界的安琪尔最喜欢世上天天“安那琪”！

记得是在初冬，下午，阴天。但不记得是在俞小姐拉琴的同一天还是另一回我又在安福路游荡（为了谛听小提琴？），忽然，从路右的“人艺”拥出一大群人向路左的“青话”狂奔过去，同时听得路人的传唤叫喊：斗祝希娟！斗祝希娟！

中国人爱看杀头，周氏兄弟早就感叹过了，尤其爱看女犯的“赤膊”赴刑，“人山人海”，但那到底是旧社会。新社会，人犯伏法拍成照片印出来，我见过，近二十年换成彩色照片了。但在“无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不许“人山人海”跟去刑场，算是文明的、替代的节目，是让革命群众看人挨批斗。祝希娟虽非女犯，但是女人，而且是60年代的名女人。刘晓庆同志不是痛陈“女人难，当名女人更难”么，不知她可曾有幸挨过斗。

拥进“青话”礼堂，台上或站或跪一排人，好像先有场批斗会很开了一会儿了，并不见祝希娟。在场的与拥进的两拨人对峙吼叫，迹近动武，接着又轰然拥进几十人，又是烟尘陡乱。那时，这种热闹叫做“冲会场”，不同派别抢场子、抢话筒、抢那被斗的人，以我们那一阵到处游荡的观看资历，见多不怪，但我一眼看见了“吴琼花”。

人丛里起一种响动，许多如我似的混进来的路人认出是她。她穿件北京人称“皮猴”上海人叫“派克”的带帽兜的灰大衣，脸色青白，疑惑而亢奋，活像“洪常青”给她松绑时不明就里的神情。她身边没人押解，不像是来挨批斗，而且紧接着她同大家昂然喊起口号来。细节是

不记得了，待到全体坐定，那伙人就占了我前面一排，而琼花本人正坐在我紧跟前，用琼花式的革命神态与身边同志急切交谈。座位是阶梯式的，她的身背在我膝前略低处，近得可以数见她头发上未及清除的发屑：在我那时的年纪，一位年轻女子贴近坐着，浑身紧张，而她竟是祝希娟？！但我糊里糊涂跟进来不就为了看她么？我害羞心跳：原来她是个真人，不是“红色娘子军”。

会场静下来，台上弯腰垂首的重又站好跪好继续挨斗，新进场的一伙大喊口号，当然，全是字正腔圆职业演员的普通话，听着真叫漂亮。祝希娟，四顾会场要喊未喊，趁一拨口号刚过，冷不防她在我耳朵一尺之隔响鞭似的添一声：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现在的影视模拟“文革”喊口号，太整齐，太空洞，响亮得不出效果，激昂得没有根据；那时，喊口号有太多心理密码与临场功能：对形势来一番表态、试探，喊！场面主控了，失控了，喊！张狂镇压、仓皇就范、愤然抗议、颓然屈从，总之，一时情急，当事人都会破口呐喊。我的一位中学班主任在被推出游街，纸糊高帽子扣得脸面不清时，竟百忙中挣出胳膊，鸭叫似的喊一声“誓死捍卫毛主席！”随即给孩子们扭得虾一般跌下身去。诸位可记得电视上江青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后，将脑袋往横里那么使劲一晃，当庭高喊“革命无罪！”么——那天祝希娟一声急叫，是为何来？

我至今不明就里……忽然，台上主持批斗的哪个声音厉声喝道：祝希娟，站出来！

全场安静。吴琼花应声起立。刚才那位喊口号的祝希娟忽儿乖顺地，唯恐耽误似的跨过几排座位和让开的人身，径直走上台去，加入那排被批斗的男人，转身面对全场，还主动对齐与其他挨斗者的身体位置，并腿站站好，然后自觉地，几乎是熟练地缩肩低头，额发随即垂落，遮没颜面。在台上的反动男人中，她触目地美丽而年轻，然而分明是一位资深的挨斗者了。

照例是连番的口号，呵斥，叫骂。她保持同一姿势，在举臂响应“打倒”她本人的口号时低头如仪，间或回答此起彼落的厉声质问，每在她回答的当口，全场鸦雀无声。

那天的结局是她被下一拨显然更有势力的人冲进来劫往别处继续批斗，会场大乱。混乱中，她被喝令下台，推出场外，旋即有位英俊的青年男演员用自行车将她带走。宛如琼花逃出水牢旋即就捕，她跳上后座的动作也是乖顺敏捷，斜坐着，埋头藏脸，双手把住骑车人的后腰背，远看活像是一对恋爱的男女。在车行的前后左右，呼啸浩荡尾随奔跑着一大群预备聚看这位电影明星继续挨斗的上海人。

人群远去，街道空了。安福路有许多旧时法租界的洋楼与松柏，一派美丽的冬日的萧条，凝成银灰色。不知为什么，那银灰色在记忆里非常上海，也非常“文革”。我没跟去，因为心里是一个男孩眼看一个被众人轮番欺负的女子的生涩同情。我对人的动作的记忆有时多于表情，真有三十多年过去了么？我清楚记得她应声上台，站好，低头，还有被劫去继续挨斗时斜倚车座的背影。我没跟去看，还因为我从她的动作无端传染了一种情绪，可能直到此刻我才明白那是什么情绪，那是人在大庭广众顾不得羞辱时的那份仓促纷乱的羞辱。

美国现在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没人说起。东岸的纽约、费城、波士顿，倒是专有出售纯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的书店，有一家店名干脆就叫“革命”，或可意译为“造反”吧。这类店家通常位于名牌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伯克莱大学校园所在街区，得一铺面，门可罗雀，但像其他生意也很清淡的小书店或古董铺，照常开着。初到美国，朋友领我走进去，劈面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卡斯特罗、胡志明诸公的照片，当然，还有毛泽东。久违了。比起美国满世界广告海报上数不清的新面孔，他们的脸让我有视觉记忆的“归属”之感——少年时，我在赣南山沟直犯愁：手边既没画册，更没半尊石膏像，怎么办呢，据说不画这些玩意儿是学不成油画的，我就下雨天缩进蚊帐用水粉色一一临摹马、恩、列、斯的彩色图片，各人的胡须虽

是一个个少下来，总归外国人，比咱中国脸多点“块面”、“体积”、“结构”，还有色调的“冷暖”，那会儿，这些素描油画的专业辞令揣在心里，不知如何是好，只晓得恭敬而惶急。

所以我在美国的“马列”书店又瞧见我初习油画的纸本“教材”和彩色“模特儿”了。

还有别的图片：李玉和举红灯，吴琼花大劈叉，雷锋挎枪站岗，陈永贵挥锄开荒，悬在墙上，封尘已久，别着标价牌子，多少美元，多少美分。书，自然都是英文译本，《毛选》是不用说了，《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都有。给枪毙掉不知多少的“托派分子”总头目托洛斯基的著作，给我党“九评”评得“体无完肤”的赫鲁晓夫著作，也有，更有许多封面上是不认得的老脸，又苦，又倔，又严肃，后来才知道谁是卢卡奇，谁是葛兰西，谁是马尔库塞——每家革命书店的气氛都有种异样的沉闷，不是因为“革命”内容，而是在层层叠叠无人光顾的书架上：这里的作者全是男人，老男人——在各国革命男人的书堆里，唯一的封面女子就是江青同志。那册书，想必就是惹她丈夫发火的《红都女皇》吧？封面照片上，只见她侧面站着，浅笑着，下巴凹进去，同个洋女人握手：是的，她在这里是唯一的女子。我于是猛然想起在我们自幼及长的记忆中，江青同志永远是一位“中央领导人”，仿佛没有性别：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

人总是忘记常识，尤其是连常识也算不上的常识。

难为江青同志，瞧，她身后孤零零在“革命”书店里与男同志们一起守革命的“节”。不过当我在北美马列主义书店的封面上见到她，时在80年代，她还活着，关押着，是要到1991年，她死于自杀：我记得年份，因为其时我正在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同一群中国艺术家弄创作。《洛杉矶时报》报道江青死讯的当晚，我们正集体去电影院看一部意大利新片子——是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

美国人进场守规矩，排队候着，天色暗下来。有位面目不清的中年白人女子沿着拦开队伍的绳子向观众散发传单。此地有的是各种商家各种团体散发传单，我们不在意，忽然那位女子快步走近：中国人？中国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吗？

她矮小枯瘦，四五十岁年纪，一见我们，眼睛闪出哀痛而狂喜的神色，轮番逼视我们，希望截住目光，同时迅速将传单塞过来，喃喃地急切地说话，声音颤抖：她死了。你们怎么想？你们有什么要说吗？！

传单是廉价的打字纸，江青大头象，印着黑框，左下角是《红色娘子军》女战士举枪劈叉的著名舞姿，还有文字，暮色里看不清文字。

队伍移动。我们掠过她，就像掠过乞讨者或街头的精神病人。她赶上几步，电影院射出的灯光照亮她的脸，目光良善、专注、凶狠，逼视着，使人不愿，也不敢看她：为什么你们没有回答！听着！她是真正的革命者，她是伟大的女人！

嘿！这时我们中的哪位笑着用英语回答：知道“文化大革命”吗？知道她害死多少人吗？

“当然！我当然知道！”她压低声音，用更其激忿的眼神搜索我们，“那就是革命！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都那样想？她是世界妇女的榜样，她是英雄，我们崇拜她！爱她！阿美利加妇女爱她！”

我们一个个穿过她身边，穿过验票的关口，那一瞬她试图拉住我的袖子，弱小得像是孩子，

手势姿影极之哀恳，我只得站住，但她的手臂又已伸向随我身后的某位，旋即放弃，退开，在暮色中愕然望着这群中国人。从闪烁着霓虹灯光的电影院内厅看出去，街上的暮色一片紫蓝，南加州仲夏的醉人的紫蓝。

那年夏末苏联政变，不久苏联没了。苏联没了，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南加州美国国防工业大机构年底大幅裁员，大片关闭。这都是后话。那天电影散场，沿街已零落张贴着江青过世的大张讣告，印刷、纸质是单色的，廉价的，同传单设计图案一样，想必是那位美国娘子军与她的美国同志们当夜张贴的。远远看去，那位分腿劈叉的舞娘好像就是江青，在南加州这座宁静小城，空旷夜市，猛瞧见这位红色娘子，来历不明，乖谬触目，同满街美国商业广告上的彩色大美女判然不同：分明欧洲宫廷的芭蕾舞姿，分明苏维埃红军军装，分明是中国窈窕女子的腰身与大腿，一枪在手，怒目圆睁，美、暴力、性感，在美国地面，“她”实在是前卫的。

说起苏维埃，说起前卫，1989年7月我在电视里看到法国人大举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盛大游行队伍打头领先的第二方阵一律苏联红军造型（雇用俄裔侨民）：尖顶红军军帽（保尔·柯察金！），双排扣红军大衣（夏天穿着多热呀），肩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老式步枪，他们穿过凯旋门，就像当年纳粹攻占巴黎，在沿街千千万万法国人的注目下，顺着香榭丽舍大道，正步前进。

法国的历史大典居然请苏联人开道，资本主义大街居然让社会主义军队先行——那年7月，苏联犹稳如泰山——法国佬真是又懂艺术又爱革命，而革命不忘艺术是艺术也不忘革命——第一方阵什么造型？

也不是法国人。哪国人呢，打住。虽然几句话就能交代……以后再说吧。

□ 原载《民间历史》

~~~~~

## 【亡灵祭坛】

纪念毛清猷老师故世四十年

• 邱励欧 •

毛清猷是复旦大学物理系讲师，在1963—64年度教过我们大班原子物理。记得他说很标准的普通话，讲课非常清晰。他高瘦的个子，有腿疾。前额很宽，鼻子尖尖的，戴着眼镜。他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研究生班，有儒雅的学者风度。

1966年文革初期，复旦大学党委为保自身，抛出大批教师，授意在校内系里批斗。毛清猷先生和殷鹏程先生就是在物理系首先被抛出来的。说什么他们有个黑房间，在里面讲黑话。实际上的黑房间是毛清猷，盛虞琴等单身教员的宿舍。加了一张沙发。总有些别的教师来闲聊或中午休息。那个时代，什么话不能上纲上线呢。或是传出去了，或是有人汇报了，就有了黑房间的罪名。我的一位66届同学只记得大字报里批过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殷鹏程先生在反右时有些言论，差点评为右派。这次再抛出来搞。

八月的某一个星期六，灾难降临到毛清猷，殷鹏程两位讲师头上，他们遭到有组织有预谋的批斗。参与者是一些物理系保党委的学生和部分政工干部。在批斗中毛、殷二老师挨了打，脸上被浇了墨汁。

会后殷鹏程回了家，幸有惊恐的家人为之洗刷。毛清猷回到单身宿舍，因受不了这样的侮辱而跳楼自杀。据说跳下时口中还叫着：“救命啊！”很惨。

是谁打了人浇了墨汁？四十年来从未追查过公布过。低头被斗的殷鹏程自然没线索，笔者的朋友辈当年都是反对打人反对整教师的，所以无人在现场。最近问到一个68届老同学，说到有一个尹姓68届男生在批斗会后回寝室夸耀自己打了二位老师，并说“今天打得真痛快！”尹某在多年后病故。66届某同学回忆：66届张某（女生）也打过。其他还有谁？始终无人调查，无人忏悔。

（此文发出以后，有一69届老同学补充，他曾随同班参加了毛老师自杀前一天的批斗会，曾亲眼看见别人给毛清猷挂上“反党分子”的牌子，学生翁某打了毛老师，搥他的头。事后这位69届同学向本班政治指导员提出关于打人的质疑，政治指导员支吾不作回答。所以根据目前统计，毛老师被不止一次批斗。）

第二天是星期天，物理系总支紧急召开另一个批斗会。殷鹏程老师本来被令出席批斗会，但临时又改变了命令，叫他回去写交代。可能是怕再多一个自杀的。

物理系的星期天批斗会是教师范围的，被批斗的是盛虞琴，王兆永，郑广恒三老师。盛虞琴与毛清猷是同室，王兆永57年时是干部，只因为某些定右派的人说了几句公道话，自己也变成右派。大约在59—60年已脱帽，这次又被抛出来。他们进会场一看，大标语上写着：“毛清猷自杀是自绝于人民！”已明白什么事了。批斗会是由总支书记老金主持的。有与会者回忆，会上金书记发言时很激动，他的手不时地敲到弯腰低头的王兆永的背上。会上三位教师脸上被人涂了墨汁，会后他们被带到物理楼大厅毛泽东像前罚跪。

大约是66年七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七号楼附近的复旦“南京路”浏览大字报，突然背后人声喧哗。我回头一看，是一群凶兮兮的学生包围着殷鹏程老师，他大约也是来看大字报的。有人找来了一张方凳子，“站上去！站上去！读大字报！”好几个人同时嚣叫。原来那块地方就正对着批殷鹏程的大字报，凳子放在“南京路”中央。只见殷先生踏上了凳子，他的目光向十几名围攻的学生扫视了一下，有几分凛然。我暗暗敬佩。那天没有打人，但已罚站示众。这是我文革中唯一的一次亲眼目睹老师被围攻，所以记得很清楚。大字报的内容至今只记得一条：是殷先生上课时讲到“概率”，用了《毛主席语录》作比方：“一本毛主席语录共有XX页，翻到任意一页的概率是多少呢？”

后来十六条发布，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中央社论一直号召“批判资反路线”，复旦造反派从六、七月的受压变成造反有理。党委无法自保，这几位老师均靠边站或劳动改造，一直作为有问题的人。直至67年春的一天，老金带了总支的几个人来殷鹏程家，讲了一下对其运动初期受冲击表示平反道歉。殷鹏程在68年工宣队时期又再次被隔离审查，这是后话。

一直到1978年某月在物理系才开了一个为毛清猷老师平反的会，由当时的系主任贾民代表学校宣布平反。毛清猷老师无家属，这个平反会也就乏善可陈。一位优秀的物理教师就这样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慢慢淡去了。

1968年工宣队对进驻上层建筑，在复旦搞了一个“九五行动”，实际上是个全校性的突击性的非法大搜查。我的寝室也被搜查过。工宣队在老金家中找到一个自制收音机，底板上画有他画过的毛主席像，于是金兆良被处以破坏毛主席宝像罪，遭批斗并下放劳动。70年后在校机修厂与我同为劳改对象和难友。只不过我是定了性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比他更重。当时机修厂有多个劳改分子，我对其中的一位难友说：“你看这个老金，他过去整人很凶，现在也懂

了不是反革命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味道了呢。”

殷鹏程在反右早期曾写过一篇“谈总结”和一付对联：对联云：  
强求干部盲目服从命令宁左勿右  
奉承领导有心响应号召只多不少

这样的话就够得上当右派了。听说是党委王零把他保了下来，定为中间偏右。原因是殷鹏程业务好，留着有用。殷因了这段历史，文革被抛出来是不可避免的。他倒达观勇敢，忘了受批斗入另册的身份，在文革后期又指导了十来个大中学生组织的基本粒子学习小组，此事在“科学的春天”那段时期还上过“解放日报”。但是他总受排挤，文革后升教授也受阻。后来王福山先生任同济物理系主任，殷自己要求去了同济当教授。以后又到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做访问教授，现退休在美。

殷鹏程教过我量子力学，王兆永教过我高等数学。王兆永为人温和。他为打成右派的同事及学生说话，虽然给自己惹了祸，倒也得到好口碑，他在80年代中期担任过复旦物理系系主任，后应聘任香港浸会学院当物理系系主任。退休后定居美国。

郑广垣，盛虞琴二位老师也已经退休。盛老师在德国定居。他们这些优秀的物理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磨难在文革四十年之际一定有许多感慨。毛清献老师的悲剧仅是文革中千万件悲剧之一，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则超出了本文的叙述范围。

老金在文革后担任过复旦监委书记，现已退休。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我在百年书画展遇见他。握手之时，彼此都提到了当年在一起劳动改造的事。校庆庆典上，我看见他戴着花环坐在院士们后面的荣誉席中，王零等退休校级领导也在其中。

八月，值此毛清献老师殒命四十周年，作文以记。

~~~~~

## 【恐怖年代】

### 关于文革的一段记忆

• 陈迈平 •

我曾经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本来以为文革已远，后来才发现，那还是一个永不消散的阴魂。

在我对文革的记忆中，有一个场景是我终生难忘的，而最近又经常在我的眼前晃动。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末的闷热的一天。上海复旦大学校园之外的家属宿舍区。黄昏之后，路灯初亮之时。我还不满十四，和宿舍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乘凉闲坐。突然，宿舍大门外人流拥动，脚步杂沓。有人在激情地大声讲话，喊叫着“造反有理”之类的口号。我们是好奇的孩子，都跑到了大门外去看。

人群最前面，领头的是复旦家属食堂的几个女炊事员，其中有个大胖女人，手里拽着另一女人的头发雄赳赳地往前走。那个女人挣扎着，嘴里不断哭求着，求求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敌不过大胖女人的力大无穷，还有周围其他女人的推推搡搡，几乎是被拖在地上往前爬。她

们边拖还不断朝那个女人吐唾沫，还有人不断乘机地从旁边从后面伸脚踢那个被拖的女人。

那年头正是大斗牛鬼蛇神的时代，连我们孩子都知道准是又要开会斗争什么人，但过去都是看红卫兵斗走资派，学生斗老师，我自己的家也被父亲系里的红卫兵来抄过了，我们还没有看过女人们也出来斗争谁，家属们要斗谁。我听耳边跑来跑去的大人们问来问去，才知道复旦家属食堂的工人要斗上司复旦家属委员会主任。

复旦的家属委员会主任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谈龙的妈妈，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的夫人。我到谈龙家去玩，都称呼谈伯母，所以今天都不记得她的名字。我那天听到是谈伯母被斗，真有点被吓坏了，因为之前都还只听说谁谁的爸爸被斗，妈妈好象都没有事，我妈妈就从来没有被斗。同学中妈妈被斗的这还是第一次。

谈家桢教授本来是留过洋的博士，后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当时他家住的是复旦最高级的第九宿舍，红色高墙之内的花园洋房和之外的简陋瓦舍颇有阶级的对比，而墙外住的包括家属食堂的工人。我记得谈龙家他爸爸从外国带回来的洋玩艺也多，比如当时少见的留声机。谈伯母也被认为是很洋派很斯文很讲体面的人物，在复旦过去是很出风头的，所以才当了家属委员会主任，大概也因为太出风头而背后总有点非议招人嫉恨。而这天谈伯母可是斯文扫地体面全无了。她被淹没在女人们的唾沫星子和咒骂声中。本来就是天热衣单的时候，撕扯之中，先是她的短袖衬衫被扯脱了撕掉了，后来是胸罩也被女人们故意扯开了，最后是半裸着上身，手被扭住，乳房垂吊着，白晰的皮肤挂上血红的指掐手抓痕迹，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刺目。

我永远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景，我现在仿佛还能看见当时谈伯母白白的乳房明晃晃垂吊的样子。

谈伯母后来被拖到了复旦大操场上的灯光球场，在复旦高能物理系当时发明的一种耀眼光下，被拖上一个台子批斗。我没有再敢跟去看，我真有点吓坏了。

第二天，我就听到了谈伯母当天批斗完被放回家就自尽的消息。我觉得我的同学谈龙真可怜，只在一夜之间，妈妈就没有了。

~~~~~

## 【往事如烟】

### 文革中的一件命案

• 宛 达 •

1966年，举国疯狂。正如历史的各个时期一样，青年学生们满怀热情，其实又单纯幼稚，加上也不乏受个人盲目目标驱使，首当其冲，整个国家沸沸扬扬。首都北京更是在聚焦点上。中国科技大学的活动在首都高校中间不算影响很大，大约书呆子多些，满脑子都还是数学，物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有一些有大智慧的人看穿了这些浪费时间才智的把戏，自在自己的领域里游弋，自得其乐。可有一件事，却是石破天惊，因为出了人命，而且不是那个时代屡见不鲜的自杀：一个归侨数学教师，周进聪，被几个对立面的学生拳击致死。

每当有朋友说起该写点文革回忆时，我就犹豫。一来是工作事务还是很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又不愿潦草几笔粗制滥造，再说年代久远，如果记忆失误事实不切，对不起当事人，还有，那毕竟是痛心，遗憾的时代。回忆它是痛苦的，毕竟是国家的伤疤。近来看见文革博物馆里的



几篇文章，触动心弦，于是尽我所能，记录一些片断。

当时的高校非常强调基础教育。我们进校的第一年只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和外语。周进聪是我们的高等数学课的辅导老师，才毕业不久，个子不高，又瘦瘦的，讲话速度不慢，讲话时总笑嘻嘻地，眼睛灵活地前顾后盼，还经常配上手势，有时还会一跳一跳地；碰巧我们这门课的主讲老师也姓周，周永佩，和周进聪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举止稳健，态度温和，于是我们这班调皮的学生分别叫他们小周和大周。高校强调基础教育，科大更是，著名科学家纷纷教基础课，华罗庚教高等数学，严济慈教普通物理等，其他教课的教师也必得有两下真功夫才能列上名单。我进校时就读的是地球物理系，数学要求虽然不能和数学系相比，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课。这两位周老师不愧是精选来的，大周上课从不带讲稿，一堂课下来，讲解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又正好从黑板的左上角板书到右下角，预定的内容全部讲完，全部板演正好留给想做笔记但没来得及记完的同学，令我们惊叹钦佩不已。小周虽然资历浅些，但也不同凡响。辅导老师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是回答同学的问题，他总是侃侃而谈，没有他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还时不时给人一些课外的难题，启发人的进一步思考和兴趣。我们当时都17，8岁，年少气盛，对老师还是有些挑剔的，可是对这两周，我们尊敬和亲近他们，对数学的兴趣有增无减。

我个人和周进聪有多一些的接触。第一个学期下来，我侥幸各门科都得了5分，于是大小周对我就多了几分重视，愿意多和我聊聊。于是我除课后和大周聊几分钟外，常去小周的宿舍（那时有问题都是去辅导教师的宿舍问，没有办公室时间）问他一些课内课外的问题。久而久之就相当熟悉了。他大我们不多，似乎更像朋友而不是师生。我不少次借他的自行车上街，还一次借过他的两辆车和同学一起上街。小周是南洋华侨，父母还都在那边，家庭富裕（要不他单身一人怎会有两辆自行车）。他爱数学之外还爱国，于是孤身一人回国工作。他是性情中人，对事对人都热情。性格外向，这部分导致了他文革中的悲剧。

大多数教师，尤其是业务教师，在文革暴发后都比较谨慎，持观望态度。他们毕竟不是学生了。但小周不是在中国长大的，没有深的城府，他直率，有话按捺不住不讲。他说话不绕弯子，口气也激烈。在南洋长大的人，走南闯北，在不同国家居住过，民主意识可能也比较强，胆子也大些。运动开始时我们的数学课已经结束了，其它课也全部停止了，我忙于自己的那些愚蠢的，却自以为是是关心国家大事，“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活动，很少见到老师们。但在67年，有一次碰巧在路上遇到小周，聊了相当长时间。那时他还没有很深地卷进派别斗争，主要谈的是当时的国内形势，他对打倒一切很反感支持我开始扶植干部的一些活动，但劝我小心，不要盲目行动，不是热情去做就好，要真正做对了才好。他说的原则是对的，但是真正做对了没有是事后才知道的，开始做的时候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判断是非。后来就几乎没碰见小周，但时而又听到传言说他发布了一些言论，激怒了谁谁等等。那时的流行语言叫作“跳出来”。当时科大大致分两派，东方红公社和延安公社，当然另外还有逍遥派。东方红公社是掌权派，也是多数派，运动开始时的“造反”派大多加入了东方红。气势比较盛。延安公社站在对立面，对事情的态度持较为温和的态度，被东方红讥为保守派。周进聪虽然性格积极开放，但政见却于延安公社一致，他成了延安公社的积极分子。而打死他的凶手都是东方红公社的铁杆。两派之争是这桩命案的基本原因。周进聪有些事情让东方红的人愤怒，其中有一件事是，东方红的人砸了延安的广播站，延安公社募捐买广播器材，他捐了很多钱。这使他成为东方红铁杆的眼中钉。他被东方红那几个人从他的宿舍里骗出来，运到某个秘密地方拷打。我也听说他会点武功，轻轻几拳对他来说不动毫发。但他越是经打就越惹得东方红的人恼火，也听说他不求饶，于是越打越重，终于出了致命的一拳（不排除用了其他凶器）。据说是肝脏破裂致死。事情发生的时间约是1968年下半年。

惊耗传来，我惊呆了。也就是政治观点不同，竟于致命。多少年过去，想起来仍然怵目

惊心，让人仰天长叹，说不尽的惋惜和遗憾。据说周进聪父亲是一位侨领，经常回国。他儿子死以后，引起周恩来等人的高度重视，这些凶手才受到较重的处置。后来听说他父母把他的骨灰带回他的出生地了。一场爱国梦，灰飞烟灭尽。

打人的那几个学生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文革，断不会走到这一步的。他们看到出了人命之后才惊醒了，知道闯下了大祸。第一个念头是逃跑，逃出北京。我后来听说他们找人帮助，设计逃跑方案，但终究不是解决办法，逃了几天后终于自首归案。其中东方红的负责人之一（当时叫总勤务员）王昌燧介入得很深。虽然他不是打了致命的一拳的那个人，但他在场，难逃其责，为此失去了大学生毕业资格，关押了一段时间出来后，四处求职无门，于是从图书馆馆员做起，后来在科学考古方面有一定建树。某种特定场合，一种反常的思维人会左右人的行动。这几个学生为此付出了终身的代价。我每每想起这个悲剧，就会为双方悲哀。人这个群体，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些，心甘情愿推出一些能人做国家领导人，希望他们组织社会，制定法律，维持秩序，交易调停，作为带头人的辛苦和贡献，他们可以享受高些的收入，有特定的待遇和荣耀。可事实上，历观古今中外，有几个带头人做到众望所归？推出了带头人，结果他们搞权力争夺，反过来草菅人命，小周（我该尊敬地称他为周老师）只是多少人中的一个。呜呼哀哉，乌托邦，永远只是一个梦想。英明的带头人，少一点私心，多一点明智，让大家和子孙后代活得舒心点，健康点，长久点，就很好了。

周进聪的名字列在所有的文革遇难者名单上。仅以此文悼念周进聪老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倘若我炎黄子孙能认真吸取历史教训，痛改前非，中国必有更好的前景。

~~~~~

#### 【难忘岁月】

打死一个，吓死一个

• 罗海鹏 •

文革时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是东方红公社、延安公社。大约是在1968年下半年，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了。延安公社成立了文攻武卫队，每天早晨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练武功，我们数学系的周进聪教师当教头。

周进聪是华侨，据说是马来西亚富商的儿子，在国外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华罗庚亲自在科大上课时，曾选他当助教，可见是相当有业务水平的。他小小的个子，看起来很精干、灵巧，笑嘻嘻地，见人很爱打招呼，大约30岁吧。我在路上碰到他，总是他主动打招呼。

不知道他怎么地竟成了延安公社的骨干了。早年在海外他就练就了一身气功，现在有了施展的场所了。每天早晨在操场上教延安公社一帮人练，使过往的东方红公社的人气得咬牙切齿。

后来，东方红公社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决定擒贼先擒王。他们充分估计了周进聪会武功，经过了周密的安排，派出几条大汉在周的宿舍附近埋伏。抓住机会，一声令下，未费什么周折，就把他擒获了。抓周进聪的理由是他是马来西亚特务。周被秘密地关在教学大楼的某个教室里，那里可能是东方红公社的据点吧。据我们班亲眼看见的同学回来讲，周被绑在那里用粗棍子打，由于他会气功，粗棍子打在身上就象打在鼓上一样反弹回来，一点事也没有，后来打手们就蒙住他的眼睛，时不时地胳肢他，趁他不注意时就猛地一棍子打过去。周进聪就这样被折腾来折腾去。到后来，打手们觉得周进聪好象没气儿了，也许他是用气功憋住气儿装死，也许他是真的不行了。他们去校医院找来一个医生，医生检查说，确实是死了。生龙活虎的一个人就这样

死掉了，不是死在武斗的战场上，而是作为一个俘虏被虐待致死了。

祸不单行。校医院的这个医生检查完周进聪的死活后，自己也吓得够呛。这几个打手警告他要严守秘密，有丝毫泄漏就有他好看的。他家住中关村，回到家里，一颗受惊吓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不巧的是当夜北京市统一突袭查户口，这是那几年经常做的事情。但是对这个医生来说，他已经是惊弓之鸟了，一敲门他就认为是东方红公社来抓他了。因为是住在楼上，他就系了根绳子从窗口爬出去逃跑，但没想到这绳子那么不结实，一承重后就断了，把他摔到了地面上，就这样摔死了。

这是科大在文革中最严重的死人事件了。几个打人凶手逃跑了，东方红公社的头头贾志斌被公安局抓起来，要拿几个凶手来交换。东方红公社派人出去，全国各地去找他们。后来在天津火车站碰上了这几个人，把他们劝回北京自首，换回了贾志斌。

我既未参加东方红公社也未参加延安公社。但这个打死人的事件发生后，我也曾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东方红公社的，如果我在两派多次对立事件的挑逗下也情绪激昂，我会不会去打人，甚至去杀人，更甚至在对方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情形下把他折磨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坏的比例因人而异，环境的影响、个人的发展变化也会不断地改变这个比例。每一个人都应该警惕自己，不要在恶劣的环境下让自己的恶劣性格大暴发。

~~~~~

## 【度日如年】

听敌台

• 阿 城 •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结束了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一九七六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一九七六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一九六六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按 decade 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边干活一边想，小时候读历史，读来读去都是大事记，大事中人，一生中因为某件大事，被记了下来，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没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过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吗？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无穷的精力，反应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你有的是时间，你甚么都没有，但你有的是时间。

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田间劳作并不影响思维，尤其是分片包干，简直是山里只有你一个人。天上白云苍狗，地上百草禽兽，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风干了的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当时都想甚么呢？杂，非常杂，甚至琐碎，难以整理。本来想到甚么，结果漫涣无边，甚至荒诞。由荒诞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维是快乐的。

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的重要事件。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一九六六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都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场上有个红点，走过去，是队里支书在蹲着抽烟。我们知道支书也是敌台热爱者，照香港的说法是敌台发烧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书说还不睡觉啊？明天还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别心思太重，甚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等等，支书一个都不理，只抽烟。

大概一个月后，省上派工作队到县里，召集队一级以上的干部到县里。队长回来后很得意，说咳，早鸡巴就晓得的事还要鸡巴搞得多紧张，把人围到山上，鸡巴山下民围得起来，妹！机头都扳开，乱就扫射，打你个鸡巴透心凉。党中央说了，鸡巴林彪逃跑了。

云南是没得鸡巴说不成话。但是只听鸡巴就想歪了，它只是语助词。

我们就做惊讶状，啊？林副主席？队长说，没的副主席啦，林彪，啊？往哪儿跑啊？咳，副主席自己有飞机，你们这些小狗日的，哪个不听敌台！还要装不知道！那你在县里也装不知道？咳，我们么，有组织嘛。

这种互相装傻冲愣，永远是我们的娱乐之一。不过，当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恐怕后人不懂注一下）传达下来的时候，立刻让我们对林氏父子另眼相待，尤其是纪要中称五七干校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大家都点头。纪要中对毛的形状刻画，简练准确，符合我们对独裁者到货想像。隔江而治，老办法，但还是好办法。隔江对峙，南边恐怕制度上会不同于北边。制度不一样，我们恐怕会好过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觉得挺高兴，有上海知青担心会在上海打得很厉害：隔么好来，瓦特了，屋里厢嘛……（那么好了，完蛋了，家里头嘛……）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历史文献。它的行文口气是文革初起时大学生的语言，不过林立果当时已经是空军作战部部长，他的文本语言，其实影响至今。我偶然看到刘亚洲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口气。平心而论，这个纪要是新中国第一份改革文献，它第一个提出现代化的关键，即，现代化首先是解决极权，尤其是独裁的问题。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即第一次现代化。苏联好像完成了，还赢了二战，所以新中国误会为工业革命并不威胁极权，尤其是工业现代化也并没有阻止德国出现希特勒。到了极权的顶峰，周恩来在九大提出四个现代化，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不久就出事了。

当下所谓的后现代，实质是针对第一次现代化，也就是解决了政治极权的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后现代要解决的是没有政治极权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的问题，以前的二级权力现在成了一级权力，商业化，媒体的权力，话语权，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国留学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现代化，教授们开出的教科书大致都属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内容。他们九十年代归来，可能忘了国内第一次现代化还没完成，党和国家极权仍在，而且退到初级阶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结果庖丁乱解牛，模糊了两次现代化。我听过不止一个留学生说，啊你不知道，国外知识已经换代了。这种话，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真是压力而又压力，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希望的压力之中。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请来美国

詹明信，批判媒体，主要是电视的权力控制。在美国，没错，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全国才有多少电视机啊！有电视机，也只是个政治权力的喉舌啊。八十年代，确实是涌入的年代，但确实将两次现代化混淆了，时髦词汇鱼目混珠。但政治权力是清醒的，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下台，改革夭折发生64。抱歉扯到八十年代了，回到七十年代。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从境外广播听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议论昨天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当地出生的人问起天安门广场有多大，那时北京知青都办回北京了，结果在场的人只有我见过天安门广场，我大致目测了周围几个山头的距离，用手划了一下，说从这儿到那儿，从这儿到那儿吧。大家一齐惊呼“妹”。“妹”是云南的惊叹表示音，等同现在港台流行过来的“哇”。惊叹时常常还会“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过我喜欢妹妹。

七十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云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太清楚，报纸也要多少天后才运到山里，收藏在党支部书记家，卷烟抽的时候都是向支书手上撕条报纸。所以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漂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漂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不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飙。

还有就是香港的宗教台，“主说……”，“主，告诉我们……”，“以西节书，第二十章，在旷野之违逆，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我那时记忆力真好，过耳不忘，随时可诵。我也不会忘记听这台的上海知青似乎睡着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泪流出。

台湾台，男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干瘪，女播音员的声音，“大陆同胞……”有点妖，男知青的话：听着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苏联台，有一个播音员声音怪，好像是叛逃过去的人，可是听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啊（很短的一个啊），莫斯科广播电台……”好像瞟了一眼甚么。

美国之音，英国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叽哩哇啦的外语，所以每个知青的收音机短波线上，都刻上道儿标出汉语台的位置。我有一个道儿刻的是BBC英语台，不是听英语，而是这个位置经常有音乐会实况转播。现场观众的哨音，乐队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挥出来了，慢慢安静下去，咳嗽，安静，音乐起，不久又有咳嗽。音质相当好，有现场的空气感。为了这个频道，七十年代中，我特地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买了一台很贵的熊猫牌全波段晶体收音机，需四个一号电池，一百六十块钱（当时一块天津手表一百二十块钱）。不很大，但一个书包放不进。我记得喇叭是椭圆型的，直径按长径算，挺大的，可分辨出定音鼓，邓丽君不在话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收音机成为晚十一点前的公共收音机，十一点一到，是我的音乐会实况转播时间，收归私有。

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

大概是一九七五还是七六年，记不清了。总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还在云南，我决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决定建立一套音响。音响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级输出、后级，或称功率放大输出，加上喇叭组成的播音系统。我当时要做的这套播音系统，其实是我那台熊猫收音机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黄其煦帮了大忙，他小学时就已经有做收音机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做我的这个巨型收音机算是手到擒来。苦他的是要满北京买零件。我不记得是我七六年上北京去取这套东西，还是有人帮我带来？总之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三天：从昆明再到所在山沟，长途汽车也是三天。就这样，一个单声道大喇叭（十寸？）的播音系统终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请黄其煦留了电唱机的插口，因为我有几张苏联和捷克的大唱片，这回我要认真地听一下它们。当然，我主要是要好好听 BBC 的音乐会实况转播。音箱我用我认为的最好的木料。还做了架子，总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势。

开播，对不起，声音有点惨。本队的和翻山越岭来听的朋友们，都挺客气，“来来来，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头牛啊，尾巴长在屁股后头哇，四个蹄子分了八瓣啊，个鸡巴硬得赛了车轴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声音不好的原因是电压的问题。前数年电拉到山沟里，电压衰减到灯丝可以直视。但我坚信电的问题会好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我还要用我的四个一号电池的熊猫收音机了。后来县里有人跑来要买，我没有卖。幸亏他没买成，因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个喇叭的手提收音机走私进来了，哇叽哇叽，震耳欲聋，八十年代提前进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开始研究树木，判断它们中的谁是好的木料。我和别人各执长解锯的一端，破开树干，锯成板材。我开始打家具，实实在在在这里生活下去。

七六年，开始死人，周恩来，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四人帮被抓，一路滑坡。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他已在听敌台的云南知青心里于一九七一年死去），买些东西，准备回云南过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无甚念头。到了队上，知青们都说，哈，你逃过去了。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倒，昏倒总要抬出去咯，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倒，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裸体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鸡巴。女知青笑浪虐虐，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刹时消耗。明月当空，星尘靡烂，惟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 原载《民间历史》

~~~~~

## 【劫后反思】

在红卫兵四十年聚会发言

• 骆小海 •

四十年前，读到毛泽东的词：“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时我们也不过十几岁，英文就叫 teenager，觉得 38 年好长，怎么是一挥间呢？现在轮到我

们感受这种时间跨度了。四十年的感觉也确实不过是一挥间，不过老友相见，觉得彼此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可是，象毛泽东那四十年一样，我们周围的世界也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否定之否定。

四十年沧桑后的今天，大家还能有机会相聚，是上天的厚爱。在美国，校友返校，就叫 Homecoming，也就是“回娘家”的意思。的确，回到清华附中，是回娘家，回到红卫兵大家庭，也是回娘家。

我想借这个机会，上对天，下对地，中对人，把自己相关的心路历程，做一个历史的交代。

#### ◇ 归结红卫兵

现在，我们大家都不免和历史的谜联系在一起了。不要说外界始终弄不清楚清华附中红卫兵是怎么冒出来的，就是当年本校的人士，只要不在红卫兵圈内，都不大知道。现在，我也学学贾雨村归结红楼梦，把红卫兵归结一下。

在这里，我要推荐一本将要出版的书：就是宋柏林日记。宋柏林，何许人也？他是当年老高三高 6 3 1 班的团支部书记。在红卫兵还处于萌芽状态的 6 6 年 5 月，被聘为红卫兵的高参。他步雷锋日记的后尘，养成了天天记日记的习惯，文革期间，一天也没拉，至今已有 4 0 本。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把他日记中涉及红卫兵的 6 6 年和 6 7 年及 6 8 年初完整出版。标题为《红卫兵兴衰录》。应该说，是非常珍贵的“原生态”史料。

香港有个新办的杂志叫《城市文艺》，是受到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那么一份文艺刊物。第 4 期把我的序言刊登了。不过有一点错，不如我这个版本准确。它这一期专门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回顾特集，也收了一些别人的文章，但都没什么意思。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为这本日记写了序言，其实就是把红卫兵成立前后的史实，从个人经历的角度，作提纲式的介绍。如果了解红卫兵初期的历史梗概，可以参看我的序言。这里，我就不重复序言中的内容了。

#### ◇ 牛奶和红卫兵

首先，我想讲一个小故事。

文化革命前夕的清华附中，伙食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是不是有这个印象？甚至有牛奶酸奶。记得当年，我们班一个同学，名字我就不说是谁了，他今天没来。就是因为这个奶的事，和学校过不去。批评学校，说是喝牛奶就是修正主义。班上爱喝牛奶的同学当然不同意。我不喝牛奶，但我也不同意。因为我想，如果奶给禁了，以后还不得禁肉？

结果他很孤立，不然文化革命可能就会因为牛奶问题爆发。

牛奶问题且按下不表。只说附中学生吃得好，与周围的普通百姓形成强烈反差。初中三年级 6 3 3 班的一些男生发现食堂窗外有个小男孩经常窥视学生吃饭。后来又来了一个小女孩。原来，他们是兄妹俩，天天饿肚子。6 3 3 班的这帮男生就决定每人每天省下一点吃的，周济兄妹俩。孩子说爸爸不给吃的，那么他们的老爸是干什么的？是附近清河毛纺厂的职工。于是，一个同学就给毛纺厂写了一封信，控告孩子的父亲虐待儿童。就在那封信发出去的当天，一个星期天，6 3 3 班这帮人其中的两位，“兔子”和“老板儿”，大家认识吧？也就是任世民和燕

长江，来到了圆明园内兄妹俩的家。那时圆明园是谁都可以去的。我们这两位慈善大使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家里破败不堪。北京的冬天是很冷的，可是连糊窗纸都没有。这是一个多子女的家。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在技校上学，二哥辍学在家放羊。全家小孩子，大冬天的，却没有内衣，裸身穿着破棉袄，鞋子露着脚指头。爸爸原来是个锅炉工，收入很低，却要供大哥上技校。我们的这两位同学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很内疚，当天就赶到邮局，把那封控告信追了回来。“老板儿”还从家里拿来衣物，送给孩子们。6 3 3 班的这帮男生又到孩子家，把家里打扫了一遍，买来新的窗户纸糊上，屋里恭恭敬敬贴上毛主席象，还帮助小孩做作业。回头又在班里发起募捐，捐钱捐饭票。没想到，这件好事班主任和团支部不仅不支持，反而批评他们“小资产阶级意识”。

我们大家也许还记得，当时的正统观念是：中国大陆穷人已经翻了身，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水深火热的是台湾，是美国，是全世界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的确，当时这个观念在北京城里深入人心。我记得我和一个外语学校的小朋友在餐馆吃饭，看到一个要饭的，我那位小朋友当时就激烈指责那位乞丐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后来，经过串联，这位小朋友也看到了中国大地的真实情况。回北京后说起来，却被他老爹的单位，新华社的城里人指控为诬蔑社会主义。可见，观念的东西有多么厉害，可以让人成为睁眼瞎。

这是一个插话。咱们还是说6 3 3 班的事。他们的募捐运动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这样，6 3 3 班的这批人就感到，教育界是有问题的，大概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态度吧。预6 5 1 班的另类观点是有道理的。所以他们很早也成了不同政见者，也就是日后的红卫兵。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是事出有因的。这个因，概括地说，就是对教育制度和教育界一些传统的做法不满。出于一种孩子气的正义感，但是却没有党内斗争和所谓路线斗争这根弦。为日后的幼稚行为埋下了伏笔。哪怕当时被大家尊为比较有思想比较成熟的王铭都曾经天真地幻想，毛泽东和刘少奇可以和平竞争，比如也让刘少奇独立出报，谈谈自己的观点。

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怎么成了不同政见者的。

#### ◇ 理想主义和党性

有人问，为什么全国文化革命的先锋不在大学，而在中学？是很奇怪。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也是外国历史上没有的。中国的五四，三一八，一二九，以及建国后的一些著名的学生运动的主体都是大学生。毛泽东也没想到这一点。他在6 6 年6 月1 日下令发表北大聂元梓等7 人的大字报，并没有立刻引起大学的学生运动。倒是未经授意的中学生早在毛泽东战略部署之前创造出来了红卫兵，主导了初期的运动，大学生当时纯属跟班的。即使后来大学生成了主角，他们的组织形式和指导思想，仍然是清华附中的叫红卫兵的这批中学生创造的，即独立的学生组织和造反精神。

当然，这种组织形式和指导思想，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一点，在当时看来，不仅很有气魄，而且是划时代的。

那么为什么我要说中学生引导了大学生？红卫兵的本质，在我个人看来，一言以蔽之，就是独立组织加造反精神。后来官办的什么红卫兵红小兵，都不算数的。这两点，却是违背传统的党性的。什么是党性？党性就是服从组织。也叫组织性纪律性。当年，上海市委奉毛泽东个人之命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就是《评海瑞罢官》，没有走传统的审批程序。引起北京市巨头政治局委员彭真的大怒，他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责问：你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中学生年纪还小，理想主义很充沛，却不懂什么党性。而大学生已是成年人，



象中国历代成人一样，世故有余，理想不足。所以，能够创造独立组织和提出造反精神的，当时只能是中学生，而且是受圆明园熏陶的、革命传统不那么足的中学生。101中学也在圆明园旁，但由于他们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子女又占大多数，革命传统太深，也出不了红卫兵。那么，红卫兵的诞生，借用林立果之类的一句话，历史地落在清华附中。

刚才说，红卫兵的本质是独立组织加造反精神。独立组织比较好理解。工作组对这个特点就很敏感，反应很强烈。那么，造反精神呢？说白了，就是不做精神奴隶。粗看，好象只是一种思想方法，不涉及思想内容，就是不做谁的精神奴隶呢？在当时发表一论时，就顾及到这一点，所以特地在“造反精神”之前，加了“革命的”这一限定词；而后又在清华大学交付铅印时，又再加上“无产阶级的”这第二个限定词。

其实，“不做精神奴隶”，已超出了思想方法的范畴。它的逻辑引申，最后只有两个前途：一个是个体的随心所欲，就是什么我都反，但这显然是死路一条；一个是在认识论过程中只承认理性，不承认任何权威、不承认任何传统、不承认任何共识，这倒是有无限的生命力。所以，我想，少年从造反精神出发，到了青年以后，还是达到理性比较好。

从历史看，我们的红卫兵并没有走向个体的随心所欲，大家始终有正义感，有理想主义，有自我反省精神，同时不乏理性。当时造反的锋芒不久就理所当然地对准了文革的最高司令部。

但是，当年提出“造反”，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当小人物、弱势群体或少数派以新的革命内容来挑战大人物、当权派或多数派的时候，没有比“造反”一词能更简洁更直观地表达这一概念了。长期以来，主张革命的人，往往把“造反”看成是革命的一种手段。的确，人类社会的进程中，总有那么一个时期，社会压迫或意识僵化到了不容任何有序变革的地步，这时，造反倒可以叫它们至少松动一下。美国有一项学术研究成果，证明革命虽然有破坏力，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有它的好处。不过，人类毕竟也在进步，连变革这种过去伤筋动骨的事，也可以变得微创或无创。我说的微创和无创是医学术语。懂医的人可能知道，现在外科手术的进步是朝什么方向呢？就是尽量少伤害你的身体，少伤害你的器官。有时候打个小洞，甚至不用打洞，就可以完成手术。就叫微创或无创。我想，人类的变革也是这样，过去暴力很多，以后暴力可以越来越少。象美国五六十年代以来黑人民权运动在法治的范围内，基本上用和平的方法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就是美国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不断进步的结果。

这里还涉及到怎样对待人类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分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也在进步。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事，或者错误地对待了你，你怎么办呢？传统上，人们习惯于不仅批判他的错误，还要追究他的为人，他的历史，他的一切一切，要给他定一个性。反动不反动，坏不坏之类的。现在，在我个人看来，这是很危险的。全面分析一个人，是不容易的，要下很多的功夫探索调查核实。很多事情，就是亲朋好友也不见得清楚。如果他只在一件两件事上有错误，或得罪了你，你就把这一两件事辨明讨个公道就行了；这叫对事不对人。如果你还要反攻，给他定性，对事又对人，那么，除非你极专业极下功夫，通常情况下，言多必有失，你多半要失误。很多冤假错案就是这么出来的。不仅在人与人之间是这样，集团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也是这样。圣经上说，不要给人下论断。看来还真是有道理的。

即使是一两件事，有时搞清楚也不大容易。辛普森的白人老婆究竟是谁杀的，现在也无法下断语。过去有句口号，叫“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现在看来，只有少数真肯下功夫方法又好的人才会有资格作一点批判的工作。

◇ 和平崛起

现在一提起红卫兵，外界就不免与“暴力”相联系。的确，暴力和过激行为也曾经蔓延到清华附中，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和平崛起”的。大家一开始，不过是打“笔墨官司”，写写文章，争论争论，总之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无非是语言激烈一些，但是并没有要伤害谁的意图。那时候，就是在斗争会上，伤害行为也是被制止的。面对北京市风行的暴力行为，红卫兵的不少成员是坚决反对的。发过紧急呼吁书，还专门写了题为“十点估计”的传单，明确反对暴力和种种过激行为，大家全体出动到北京市内广为宣传。我当时和两个女孩为一个小组进城。虽然如此，校内的不幸事件还是发生了。

今天我不想在这里辨析历史细节，但是我要特别谈谈对暴力的认识。

我们在学生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暴力革命，把暴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来接受。其实，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人类的发展，是朝着减少暴力的方向前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印度独立运动，日本的民主改革，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运动，菲律宾微笑革命，苏联东欧外蒙民主运动，南韩和台湾民主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是非暴力改变社会的范例。特别是，首先在欧美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有一套不断完善机制，使社会矛盾的解决和社会变革有可能循着最小暴力的路径行进。这是人类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一项重大成果。这都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前几年到北京和上海，都不幸目睹了人们为了在公交车辆上争夺座位而大打出手。不久前看到一则新闻，两个农民邻居为了踩坏麦苗的小事而互殴致残。这就是很多国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习惯性或者说脾气。而主流的文艺作品也在提倡这种霸气、大爷脾气或者好听一点是英雄气概。现在不是有“和谐社会”的说法吗？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结构，也取决于文化习惯。

#### ◇ 阶级观念

革命暴力问题，是与阶级斗争观念分不开的。因为你看见的不再是人，而是善恶分明贵贱分明的阶级。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是当年革命的正统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精髓嘛。而且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种观念被推广到全社会。毛泽东说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且要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学校也被认为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贯彻所谓的阶级路线。在文革中，阶级路线恶性发展，人群按家庭出身被分成三六九等，大批人受到了歧视和迫害。

从这种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仅仅依靠某种对立的思想或个人的善良还是不够的。忆苦思甜，就足以诱导不少善良的人，产生阶级仇恨。我认为，这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各种思潮。当然，无止境地追求知识，对某些人来说，是辛苦的事；对另一些人来说，又是愉快胜任的事。所以，以平等为核心的某种信仰，对于知识懒汉来说，不失为一种替代品。

#### ◇ 现在看红卫兵的宿命

我提出一个假设：当年，如果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受上层和周边干扰，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办成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学校，实行着巴黎公社的原则。这个学校的蓝图好像是宋柏林起草的。当然这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至少不会和破四旧，武斗，党内斗争联系起来。这些都不是他们的发明，不是他们的初衷。也没有这样的想象力。

有人说，红卫兵被利用了。泛泛地这么说，也许有道理。但具体到清华附中，就不适用。在我看来，中国红卫兵运动的主要功能，是使原来的统治体系瘫痪。清华附中红卫兵没有产生这类想法，更不具备这种资质。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不会依靠我们来达到这个目的。等到1966年下半年以大学生为先导的造反派登上历史舞台，这才成为可能。所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们很快被运动甩在一边，除了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外，没有任何其他存在的理由或意义。

观察文革，要看它的主要风暴轨迹。清华附中，顶多是个起风的尖。用文雅的话说，就是意外的青萍之末。或者是浑沌论里说的蝴蝶煽动翅膀。

红卫兵这一段经历，对我们大家来说，只是人生道路上起步阶段中一个短暂的但又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台阶。有的东西变了，有的东西没有变。无论怎样，它留下的是一个有着终生的铁的友谊的群体。这也是一个终生善良、正直、认真、有为的群体，他们多数人在人生的道路中，展现了正义的思想，优秀的品质，出色的才华，为人类作出了尽心尽力的贡献。这些，和当年的红卫兵经历是分不开的。我很为我们大家而自豪。我属于这个群体，我觉得很光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大家在各行各业确实都作出了很了不起的成绩。大家始终善良，正直，没有和那些骗子，贪官污吏混在一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

【各抒己见】

二〇〇九年的八·一八

• 刘自立 •

文革四十年后，红卫兵创建者之一在一次聚会上说，他们创建红卫兵是一件不悔且自豪的事情——“红卫兵这一段经历，对我们大家来说，只是人生道路上起步阶段中一个短暂的但又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台阶。有的东西变了，有的东西没有变。无论怎样，它留下的是一个有着终生的铁的友谊的群体。这也是一个终生善良、正直、认真、有为的群体，他们多数人在人生的道路中，展现了正义的思想，优秀的品质，出色的才华，为人类作出了尽心尽力的贡献。这些，和当年的红卫兵经历是分不开的。我很为我们大家而自豪。我属于这个群体，我觉得很光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大家在各行各业确实都作出了很了不起的成绩。大家始终善良，正直，没有和那些骗子，贪官污吏混在一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读到这段话，什么人会赞赏和首肯之？只能是当年那些红卫兵和现在走上暴富道路且掌握了权柄的官吏，如，什么大将，中將，什么董事，经理，什么委员会委员，不一而足——就是没有任何合法性和宪政选中人——而另外一些反叛者红卫兵，成为海内外异议者和独立思考中人，秉承独立精神，坚持异端另说，自是自外于这个人群——这种分化，在前红卫兵的视线中是选择性视盲，见之不见也。就像当年插队和去兵团一帮人，在一二年中便被分化成为领导者和人民份子，也就是所谓建设者，工人农民和劳动者和特权者——人民，广大知识青年，成为特权红卫兵的庶民和奴隶，并未见诸于任何权势领地。前红卫兵话语的特征和语势，依然是四十年前的优越感表达，自不待言。这是他们半个世纪，没有跃进和成长之红卫兵“小老苗”特征。他们自豪于这个四十年不长进，说明中国人彻底悲哀的毛主义桎梏丝毫未见放松。当然，这个思潮和海外左派拥戴毛文革主义者，迄今仍然纠缠不休，理也乱。

至今，红卫兵运动业已四十三年。学习着毛之派头和语势说话者，用“弹指一挥间”来回忆他的红卫兵生涯，从而定义红卫兵，究竟说了些什么？一个就是“造反精神”，一个就是“独立思考”——这个假独立、伪命题，撑乎其间。众所周知，毛造反和毛革命，在四九年以后的

历次权力斗争中，都是以忽而体制之外，忽而体制之内、大打独裁者克里司马游戏牌。他以他本人政策失败、政策残酷，培养了国家随时可以造反，也随时可以受压、受死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无规则。他将几千万人饿死的革命基因，作为他发动不满于体制的内在诱因，而启动造反机器。殊不知，这个革命造反基因的罪责，就是他本人的体制所致，政策所致——而红卫兵创建人，居然将此毛主义造反，并同于人权，个性和良性革命意志（英、法、美人权革命和三权革命），模糊其间的政治界限和常识界限，将千古罪人毛，依然看成他们的启蒙者和导师，并将四十年以后，毛对国人的政治强奸，看成他们成长的营养——真是到达认贼为父，助纣虐的程度。

毛主义造反的彻底负面意义，就是他的出道，甚至颠覆了刘邓陈等人的起码的极权主义社会秩序和教育持续说，走上极权主义里最坏的极权主义道路，也就是变文革前秩序为无法无天的皇帝新衣和赤裸裸的屠杀。这是毛利用红卫兵，启动他们批判欲和破坏欲，达致破坏刘邓秩序的蛊惑性宣传伎俩。这个伎俩，居然在年纪已达六十开外之老年前红卫兵里，依然无视其非，无视其罪，无视其邪恶。这是任何一类懂得毛之人民革命，以反对黑化，导致赤化者，早已目睹之历史——这个历史，以红卫兵破坏六十年中期、尚且可以吃饱饭的最起码社会状况为出发点；那导致三年饥荒后不满情绪的社会动机，其实就是满地的造反和革命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毛本人应该负起罪者的革命动因。而毛造反运动，将此基本是非扭曲为发动恶性革命的借口，本来就是贼喊捉贼。六四年以后，这两三年时期，国虽不康，民却稍息的局面，就是这样又被尽数颠覆。毛运用的造反思想，就是骆氏所谓的造反精神和独立思考，再次破坏了稍息和“稳定”。且不说大格局中，毛极权中何来造反和独立这样的局面之真正可能性——毛社会，本来就是无社会，无阶级（斗争权限）之社会；社会阶级，阶层和独立存在业已被他一手砍断；缴械者被杀死，工农的斗争权限业已消失；政权只剩下新皇上比老皇上更加无道，无统，无学之“新衣”——何谈你骆氏或者红卫兵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呢？他不过是通过革命蛊惑论，要实行新一轮个人迷信和极权之最坏主义而已。四十年后，身在美国的红卫兵，居然就连这样一点点革命和社会常识也没有。这恐怕就是红卫兵就是红卫兵之结局了。红卫兵一朝不认可自身的历史之极端邪恶，而走上反思和检举之路，他们一朝就毫无价值论和论价值之任何可能。四十年，他们白活在美国这个民主体制里，只是以抱残守缺为其新老人之冬烘意识。这是他们秉承统治阶级思想为其自身思想的铁证。

一九六六年的八一八，迄今业已快满四十三年。今年的事情表现在文革反思上，就是证明，老红卫兵中人，丝毫没有任何反思警醒之处。骆氏发言，最近在圈子里流窜；宋要武，刘静等人搞出和解会谈，依然秉持其似是而非的护罪论；卞仲耘被暴力致死之案件，仍旧真相不明；这一类文革情结，依然不得解释和认知——甚至要美国人哈里斯出面来一个真相探索和法律追究。随着年代的逝去，老一辈懂得文革的研究者和学人逐渐死去，中青年一代中人，越来越不知道文革究为何物？他们和西方人中，将毛看成“人类灯塔”（毛死时，吉斯卡尔·德斯坦语言）之言论，沆瀣一道，大谈中国价值和“同舟共济”论，中美双赢论；业已在一种十分诡秘的路途上，滑向万劫不复之地。

其实，以上绍述之所有这些问题，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之处是，骆氏所言之造反精神，在文革中后期，业已完结，寿终正寝。包括清华附中和很多中学的革命意识，随着文革的结束和邓氏时代开辟的特权红卫兵掌权时期，造反论，彻底被虚以尾蛇，左顾右盼——特权爆炸，暴富与之，成为他们遗弃造反，反对造反之起点——而这个起点，正好磨合其最初拿到革命权，实行阿Q主义，不许别人造反的新一轮、独自享有权钱交易之新游戏；造反，业已被关入牢笼，代之以所谓改革和转型——这个改革和转型，就是彻底放弃毛造反之吃社会主义之草的革命阶段，而走上吃资本主义肥实的实用意识和新意识形态，就是赤、黑兼顾的恶性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于是，所有当年造反中人之联动或者什么动，一朝废弃革命，皆转化成为秩序维护者。他们现在并非以毛之两面体，体制加非体制，为原则，而是以彻底颠覆造反和革命，为能事——

拿他们的话，叫做“和谐”，叫做“代表”，叫做“执政”，云云乎。所以，骆氏不言及此，正好说明，他不能接续论毛造反，何以变成邓六四之事实，之历史。这个转换，就是彻底否定红卫兵作为革命造反秩序论的伪命题，还原于官权“坐天下”的新党性，新官观。看不见这一点，就像看不见毛造反、其实就是毛体制内镇压；而邓改革，其实就是反反秩序、反造反，一样愚蠢，一样目眇。共产党的辩证法教授了一百年，可惜，红卫兵十几岁写造反，却在六十岁，写不出造反之反论来，实在是枉顾了才高毛认的“辉煌历史”。

八。一八，四十三年了。国人携带这个困境，应付很多于此连带之难题，确乎到了大反思之时期。

愿景何在？在于认同毛造反，还是认同邓六四——镇压造反，这还是一个问題。

~~~~~

### 【人物春秋】

“凌伊”先生

• 朱学勤 •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当时有一点费解，至今未解：将“四人帮”称为“上海帮”，是否妥当？且不说上海是中共诞生地，伟大光荣正确，以此命名帮派丑类，令人发生不愉快联想，政治上很不严肃；但说那四人中没有一个说上海话，生活方式亦无半点市民习性，即不能服人。他们确曾在那里工作过，或地下或地上，那是为了抢占上海，而不是代表上海，更不是护卫上海。如果一定要与上海挂钩，那也只能怪这个城市华洋杂处，好歹不分：这些人成名于三十年代“左联”活动，江青是在左翼演艺界被捧成进步明星；张春桥以狄克为名攻击鲁迅，是嫌鲁迅左得不够，要与鲁迅比革命；姚文元年青，乃父姚蓬子曾任“左联”全国常委，得其家传，也可称左翼传人。“左联”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今日电视剧《暗算》中有形象反应，剧中人大多在暗处，枪一响，路边市民一脸惊愕，浑不知那些奔出街角的身影是在代表他们的根本大利。还可以伦敦为例（这个城市太像伦敦，不仅仅外滩景观与泰晤士河畔形似），马克思《资本论》成书于伦敦，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于伦敦，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成立于伦敦，这些活动与伦敦市民有什么关系？有哪一派史学家因此而称这些人为“伦敦帮”？王洪文当然是另类，却是个说东北话的保卫科干事，与城市习性距离更远。1976年揭批查“三种人”，是要追究“历史根源”的，将这一帮派命名为“左联帮”不是比“上海帮”更贴切，也更有利于打开历史纵深吗？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得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了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革命？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上说：王张江姚“一举粉碎”后，“上海帮”群龙无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

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覆引用，也像刀刻一样刻在我心里三十年，怎

么擦也擦不去。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他读历史读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下机即逮捕，入狱十四年。

十四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惜。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1948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1964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闻讯，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晚清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区，住复旦老房子，拿复旦讲师工资。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去给他装上。1974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1976年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两百元生活费，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吝一面。又过十一、二年，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个大热天，他穿一件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一把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就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旧，说文革中他有一个复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那人军装刚上身，913事发，剥下军装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宋德金先生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调入毛家湾任秘书，913后隔离清查十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招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三十年后今天，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奉召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市。老先生三十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周恩来高兴，突然说要请客，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贤也在座，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很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1974年前后，毛泽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凉，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贤说，913事件后，张春桥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扭转当时“批林”局势，批“极左”转为批“极右”。毛一改颓丧，如私塾先生见弟子优秀作文，加圈再加圈，连画五个圈，超过文革初期激赏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此后毛交代张在上海试行“破资产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遂悄然搁置：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保姆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六个

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这是1976年的9月21日，此时还在钓鱼台，却已经和秦城差不多了。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是打通古今，大彻大悟。第一次问，他回顾狱中重读二十四史，曾掷卷长叹：“一场夺嫡之争，我何苦卷进！”第二次问，他正在点校《春秋繁露》，遂以汉史为注：一代君主雄起，总要新臣制老臣，遂出内、外朝之分；内朝多文人，外朝多重臣，太上一蹬腿，外朝“快”打“慢”，汲黯、晁错见黜被诛，古今皆然。第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一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seminar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此外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十二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圣旨，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圣旨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一千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后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没啥稀奇。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yz-info@cnd.org](mailto: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